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緣起

《續修四庫全書》是，經新聞出版署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批准的國家重點出版項目。其收錄範圍，包括《四庫全書》以外的現存中國古籍，即補輯乾隆以前有價值的而為《四庫全書》所未收的著述，以及系統輯集乾隆以後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前各類有代表性的著作，共收書五千餘種。這是繼十八世紀清朝編修《四庫全書》之後，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較大規模的清理與彙集。《四庫全書》所收書，據史學家陳垣一九二二年對文津閣本所作的統計，共三千四百六十二種，另有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一）。《續修四庫全書》所收書，其種數約相當於《四庫全書》的一倍半。《續修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配套，將構築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書庫，中國古代即一九一二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大致齊備。這對於保存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無疑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清朝政府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開始向各地徵集圖書，次年，又命於《永樂

大典》中綴輯散篇，依經史子集搜輯遺籍，由此肇始，集中大批財力物力，組織當時在各學科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以十年的時間，編纂成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叢書。

對於這樣一部由清朝政府組織纂修的大型叢書，本世紀初以來，已有不少人提出批評。批評的集中點，一是清政府「寓禁於徵」，凡書中內容被認為有「違礙」、「悖逆」的，概予摒棄，禁止通行，直至銷燬，在徵集圖書及修纂過程中，約共禁燬書籍三千種^(二)；二是刪改原文，特別是南北宋之交以及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著作，凡認為對金、元及清人有詆侮處（如稱虜、賊、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竄，甚至成段成篇地刪除^(三)。

應當說，這些批評是符合實際的，上述兩點造成了這部有歷史價值的大書無可彌補的錯失。現在看來，還有一個缺陷，即當時限於社會條件，還不可能更廣泛地搜集各地藏書，也由於受正統觀念的局限，一些被視為小道的有價值的民間文學創作及戲曲、小說，被排除在全書之外。

當然，在過了二百多年之後，特別是中國社會已經歷了重大的根本性變化，我們現在完全可以站在二十世紀發展的高度來整體衡量清修《四庫全書》的得失。《四庫全書》雖有種種錯失和不足，但整個說來，它對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是功大於過的。首先，清政府通

過各種不同的渠道，系統徵集圖書，如各省採進及私人進獻，內府藏書的揀選，通行本的採購，其規模之大遠遠超越前代。特別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清代已佚之書，不僅保存了元明以來不少頗有文獻價值的著作，還為乾隆以後的古籍輯佚開創良好的風氣和提供有益的經驗。中國古書的流傳、保存有一個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現象，即凡是編輯成叢書的，往往不易散佚，特別是官修大書。通過纂修《四庫全書》，把分散的羣書集為一體，二百年來雖歷經戰亂，但還是完好無損。這就是歷史本身作出的回答。

《四庫全書》修成後，先是繕寫四部，分藏內廷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故宮的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後來又抄寫三部，庋藏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八日諭），也就是所謂「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一日諭）^{〔四〕}。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術的傳播與繁榮。至於《四庫全書》的編纂體例，一則汲取前代四部分類法的長處，注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二則折衷於諸家目錄之間，重新合理安排部類，考校原書，詳為釐定。尤其是為各書撰寫提要，「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

增刪，篇帙分合」《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當時參預纂修和撰寫提要的，多為各學科有成就的學者，如戴震、邵晉涵、翁方綱、周永年、姚鼐等，因此二百卷的總目提要，實際上是對乾隆以前中國典籍的一次系統分類和全面總結。在這之後，要想瞭解先秦至清前期二千多年的中國學術、思想、文化，是離不開《四庫提要》這一治學門徑的。

《四庫全書》雖是一部大書，仍不免有所遺漏。嘉慶初，當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即因職務之便，在江南陸續採購《四庫》未收書一百七十多種，向朝廷進呈，并仿《總目》的體例，與當地著名藏書家鮑廷博等參互審訂，對每一部書都寫有提要，這就是著名的《四庫未收書提要》，後為其子阮福編入阮元的《擘經室外集》。這可以說是乾隆以後對《四庫全書》擬加補修的開端。

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書，提議「重新開館，續纂前書」。王氏申述的理由是：（一）自乾隆以來，「時經百載，開通日廣，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二）「又有乾隆以後，通才碩學，網羅散失，採集遺佚，復古再成之書，說經補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書，以及天文、算學、輿地、方志、政書、奏議、私家撰著，卓然經世之書，層見疊出，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稱者偽而改題者真」；（三）「考據之門，

後來居上，藝數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類，上溯舊例應行著錄者，其爲萃美，庶幾前編〔五〕。王懿榮的意見，應當說是大致符合乾隆以後學術發展的狀況的。自此之後，如章梈、喻長霖、孫同康等也都有續修之議〔六〕。當然，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發生急劇的變化，西方的科學技術與社會政治學說不斷輸入，有些人爲維繫世道人心，想重新用中國本土學術來抵制外來的影響，如喻長霖提出：「今海宇大通，羣言龐亂，後生小子，震於泰西富強之說，卮言日出，大道將歧，非續編書目，明定宗旨，排斥邪說，不足以靖羣議之囂，而齊一天下之耳目〔七〕。」這是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上奏的。已是戊戌變法之後，辛亥革命前夕，卻還有人抱編集舊籍以「排斥邪說」的態度，可見晚清時主張續編《四庫全書》的，也還有不同的思想動因，值得現代學者加以分析和探討。

「五四」之後，續修建議再起。先是一九一九年，葉恭綽等赴歐考察回來，動議影印《四庫全書》。金梁則認爲「書不易續，目則易修」，建議將「二百年來新出書籍」，「始存其目，以待後來」。二者皆以時局動亂未果。一九二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提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計劃，并擬以多銷贏餘，「請海內通人，選擇四庫存目及未收書，刊爲續編」。一時間邵瑞彭、黃文弼、李盛鐸、倫明等人，羣起響應。李盛鐸還因此而特地謁見當時北洋政府執

政段祺瑞，商議續編辦法，提出所收書擬分作三種類型：（一）《四庫全書》將具有民族思想及歷代反對君主思想諸書悉摒弗錄，此類著作彌有價值，均應收入。（二）乾隆以後刊刻諸書，以年代稍後未列入《四庫全書》的，應予續編。（三）凡有價值而稍次的，則錄其大概，列入後部（八）。商務印書館的影印計劃，終因當時各種人爲事故及軍閥混戰而擱置，續編的動議、計劃也隨即流爲一紙空文。

一九二八年，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下屬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曾擬利用日本退還的庚子賠款，將續修之事列爲課題，並開始購求古書。但因當時日本逐步侵略我國東北、華北，時局動蕩，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戰爭及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起，續修之事也就拖沓十餘年，逐步停息，祇剩下當時北平地區一些中國學者爲續修而撰寫的相當一部分乾隆以後著述提要，算是長達幾十年間各種動議不斷破滅而終於留下來的一定的實績（九）。

今天，也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續修《四庫全書》的想望終於成爲了現實。

續修《四庫全書》之所以必要，最主要的客觀依據，是乾隆以後近二百年間的文化發展和學術積累。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對有清一代的學術作了極高的評價，說：「自漢以後，學術之盛，莫過於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經學、史學皆足以陵駕前代，然其尤卓絕者

則曰小學「一〇」。」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它的前期和中期，農業、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可以說達到中國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那時國力強大，版圖遼闊，文化事業也隨之興旺發達。在其後期，也即鴉片戰爭以後，受資本主義列強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割地賠款，社會危機加深，但文化學術卻因受國勢陵替的刺激和西方思想的衝擊而另闢新境。王國維所說的三百年，最有特色的應是清代中期的乾嘉之學和後期的新學。《四庫全書》是乾隆中期纂修的，那時參預纂修的一大批學問家，如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朱筠、彭元瑞、程晉芳、任大椿、孫希旦、王念孫、莊存與、謝墉等，都是乾嘉之學的佼佼者，而他們的著作一種也沒有收入到《四庫全書》中去。這當然是當時纂修體制所決定的，但由此也可看出，要研究中國傳統學問，不把如此衆多的上述代表人物的著作加以彙集整理，就根本不可能有效地進行。

王國維提到清代的經學、史學足以陵駕前代，這是有根據的。中國古代經學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而清代則是極其重要的帶有總結性的階段，特別是在經書文字的解釋和名物制度的考訂上，成果纍纍，而這些成果，大多數是產生在乾隆時期及以後的一百年間。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列舉清代治《左傳》、《公羊》、《穀梁》、《爾雅》、《尚

書》、《論語》、《孟子》、《詩經》、《周禮》、《儀禮》、《禮記》等學人，及治小學的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以及治《說文》的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這些學者燦如羣星的著述都是《四庫全書》所未及收的。史部如對前代各史所作的補志補表，錢大昕、王鳴盛、趙翼諸大家的考史之作，特別是嘉道間興起的西北地理之學，以及現代中國考古學前身、道咸間日益興盛的金石學，都莫不有其時代的特點。至於王國維所沒有提到的子、集兩部，乾隆以後也有不少高水平的著作。清人對先秦諸子所下的工夫是很深的，我們可以舉出如盧文弨、謝墉之校《荀子》，孫星衍之校《孫子》、《吳子》，顧廣圻之校《韓非子》，嚴可均之校《慎子》、《呂氏春秋》等，又如魏源的《老子本義》、郭慶藩的《莊子集釋》、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洪頤煊的《管子義證》、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等等，可以說乾隆以後百餘年間是中國古代諸子學的又一個發達時期。至於集部，包括那一時期哲學、思想等人文學著作，則隨着中國社會的大變動，更有新的嬗變和飛躍，表現出由傳統向現代學術的發展。

可以想見，以上眾多的著作，如果不加以彙集與分類編纂，就無法兼容並收。這次《續修四庫全書》的纂修，其主要的部分就是《四庫全書》成書後至一九一二年以前的典籍，是對這將近二百年間學術文化發展進行一次新的歸納和總結。

民國初期議及續修《四庫全書》時，就有人談到續修應解決兩大問題，「有在修書之前未經發見者，有在修書後未及收錄者，前者宜補，後者宜續」^{（一一）}。《四庫全書》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更爲完備。但由於種種原因，清以前的書應收而未收的，還有不少。我們這次補輯乾隆以前的書，大體上即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四庫全書》及存目均未著錄的，另一部分是列於存目而仍有一定價值的。茲分別舉例介紹如下。

南宋人魏了翁，是一位理學名家，史稱其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一二）}。明張萱重編內閣書目，載《九經要義》尚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則明時內閣僅存七經，其間當尚有缺佚。《四庫全書》所錄爲《周易要義》十卷、《尚書要義》十七卷（《提要》謂原目二十卷，缺卷七、八、九共三卷。文淵閣本實存十四卷，缺卷七至九、十二至十四等六卷）、《儀禮要義》五十卷（存四十八卷，缺卷三〇、三一兩卷）、《春秋要義》三十一卷（《提要》謂原本六十卷，存三十一卷。實存二十七卷），即僅錄四經。今所知者，阮元《四庫未收書目》載有《禮記要義》三十三卷^{（一三）}，而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有宋淳祐十二年徽州刻本《毛詩要義》二十

卷。這樣，此次《續修四庫全書》即可補入宋人所著《毛詩要義》、《禮記要義》兩種。又如宋劉克《詩說》十二卷，爲南宋論《詩經》宗尚呂祖謙一派；謝枋得《詩傳注疏》三卷，其書多爲元人稱引，都是宋人說《詩》值得注意的著作，我們這次也補《四庫》所未收（二四）。爲篇幅所限，這裏僅舉經部的幾類例子，其他宋、元、明等朝的各類著作，可補者還有不少，不一詳舉。

另外，有些書雖經《四庫》著錄，但由於當時還未能對全國藏書進行普遍查覈，因此有不少重要著作的存世最佳刻本未能選入，其間尚有所收書內容不甚完整的情況。如《四庫全書》雖收有內府刊本《周易注疏》（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經我們這次調查，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的《周易注疏》十三卷，是中國歷史上產生的第一個經、注、單疏合刻本，其學術價值爲清修《四庫》本所不能比擬。故此次續修，對這類於研究中國傳統文化關係極大的文獻，儘管《四庫》已收，仍酌予收入。除宋刊《周易注疏》、《周易正義》（即單疏本）以外，尚書類中收有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二十卷，它非但是該書的第一個經、注、單疏合刻本，而且是當年楊守敬從日本購回的（今藏北京圖書館），屬舉世孤罕。又如元刊本宋陳大猷《尚書集傳》十二卷《或問》二卷，清修《四庫全書》時祇見

到《或問》二卷，謂《集傳》十二卷已佚，「存者唯此二卷」，甚表遺憾。現在我們查到元刊本十二卷，即列入《續修》中。又如蘇轍於中年時撰有《詩集傳》二十卷，然在宋代被目爲文人解經，非治學正宗，未被重視。至明代焦竑，始發現其學術價值，并刻入《兩蘇經解》，但卷第卻合爲十九卷。清修《四庫全書》時，此書的宋淳熙筠州公使庫刻本即藏於京郊圓明園，近在咫尺，四庫館臣卻根本不知，反誤用明本。經部的情况如此，其他史、子、集等部都有類似的情况。以集部而論，如《四庫》別集類著錄唐王績《東臯子集》三卷，提要中引及《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等，說是原爲五卷，乃其友人呂才所編，而今本實止三卷。殊不知五卷本的王績集實存於世，上海圖書館即藏有《王無功文集》五卷，係清乾隆年間朱筠抄本，書前有呂才序，也爲清修《四庫》時所未及見的〔一五〕。又如與明代戲曲家極有關係的梅鼎祚集，《四庫》存目中僅著錄《梅禹金集》二十卷，有詩無文。經我們調查，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山西大學圖書館等均藏有梅氏《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明天啓三年刻本，爲其詩文全集〔一六〕。以上祇能舉例，於此也可見出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版本普查，并汲取近世公私藏書目錄的成果，對於提高《續修四庫全書》的質量，具有何等必要性和迫切性，這也是我們在編纂中力求嚴謹的責任所在。

如何評價《四庫全書》存目，這是一個學術問題，應該掌握充分材料，進行全面的探討。近些年來已有學者對此進行研究。我們在這裏限於篇幅，當然不可能對存目所收著作全面的論析。從纂修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當時修書館臣主要還是從學術和資料着眼，決定去取。對同一個人的著作，也區別對待，如王夫之的《尚書稗疏》和《尚書引義》，一加著錄，一入存目，並不因為王夫之的政治態度而一概排斥。當然，《尚書引義》所論今天看來也尚有可取之處，我們這次爲了有助於全面研究王夫之的學術思想，還是輯入《續修》之中。又如明張獻翼《讀易記聞》，已編入《四庫》，其《讀易韻考》，被認為「紕漏殊甚」，即列爲存目。又如清人余蕭客，其《古經解鈎沉》，《四庫》於經部五經總義類著錄，認為「採掇舊詁，最爲詳覈」，而其另一書《文選音義》，則被指爲「罅漏叢生，如出二手」，列於集部總集類存目。江藩《漢學師承記》也記余氏晚年悔其少作，另撰《文選雜題》三十卷，於病革時託付其弟子，以代替《音義》一書（一七）。經部中那些鄉塾課蒙之本及爲科舉應試所編的淺俗之作，被列入存目，也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當然也有已見於著錄的全集，其單刻爲避免重複而列於存目的。對於存目的書，提要也不是一概貶斥，其間也有肯定其某些可取之處的，如評明唐鶴徵《周易象義》，稱「雖自出新解，而於經文亦足相發」；於明陸夢龍《易略》，肯定其

「不取河圖、洛書之說，則頗有卓見」。當然，當時修書諸臣，大多立足於漢學，對宋學多有所譏評，去取之間，有失持平（如宋王柏的《書疑》、《詩疑》皆入存目，理由即因「攻駁毛、鄭不已」）；在對明代別集的處理上，也否定太多，以致多數明人詩文集列入存目。存目的分類也間有不當之處。如同爲《四六珠叢彙選》十卷，既收入子部類書類，又收入集部總集類，當係成於衆手，各不相謀。

應當說，當時參預《四庫全書》纂修的學者，對一些書籍是列入四庫還是列入存目，取舍之間是有一定的學術衡量的。大體說來，存目中的書，比起《四庫全書》所收書無論學術價值還是資料價值，都相差甚遠，而且其中還有不少重複。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對現存存目的書作實事求是的評估，選擇一部分仍有研究價值的著作編入《續修》之中，以見出中國學術發展的整體面貌。這也是《續修四庫全書》保持學術系統性、完整性所不可或缺的。

總之，《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專一注重於學術，而不濫收資料。因此，如宗譜、家乘、曆書、鄉試錄、會試錄、登科錄、縉紳錄等，雖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因種數過繁，此次就暫不收錄。於兵書、醫籍、藥典、方劑之書，亦遴選從嚴，以免冗雜。對於佛教典籍，則僅收中土著述之精者。叢書原則上也不收。這些方面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吸取了《四庫全書》纂

修中某些好的經驗的。

關於編纂中一些具體問題，請參閱本書《凡例》。

編纂這樣一部大書，我們是充分估計其工作難度的。但我們也看到目前進行這項工作的有利的一面。當前我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學術繁榮，具備編纂這樣一部大書的最有利的社會環境。古籍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事業得到空前的發展，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一部網羅國內各藏書單位豐富收藏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已經編成，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齊。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直接主持的《中國古籍總目提要》，已經集合起大批古籍研究專家，特別是各圖書館的版本目錄學家，正在對全國存世的古籍進行全面普查，並將逐步編印出完整的古籍品種及主要版本的總目錄。這些都可為《續修四庫全書》提供充分的資料準備和扎實的工作基礎。

我們的編纂工作，第一步即是進行普查。我們首先以北京圖書館（包括分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十一家圖書館十二個藏書單位作為重點普查對象。根據上述單位的藏書，再參照《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中的《中